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 赓续与延展

杜仕菊 刘林

【摘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时代理论，“新时代”重大判断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新飞跃。这一具有科学性的重大判断是基于中国内外部条件的“变与不变”提出的，“三大维度”是“新时代”重大判断的宏观视角。“新时代”重大判断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科学性继承和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赓续；延展

【作者简介】杜仕菊、刘林，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原文出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京），2020.2.28～31，143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课题“新时代的哲学意涵”（项目批准号：18JF046）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P10)}结合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历史演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视角，科学把握“新时代”的立论依据与基本内涵，厘清其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正确认识“新时代”的伟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历史演进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观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在不同时代场域的具体理论形态，是对各自所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发展道路的科学定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进程、现代化进程的认识不断深入。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研究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划分时代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了有关时代划分的相关理论。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P204)}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制度的转变，是时代研判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P592)}基于三个大的时代的划分，恩格斯鲜明地指出，“文明时代”三大阶级社会存在阶级压迫与阶级反抗，阶级社会发展以两大阶级的零和博弈为外部表征。而超越三大阶级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国家消失，是“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4](P193)}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时代划分与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有其内在的逻辑。无论是社会个体视域下，还是社会整体视域下，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都必须基于物质生产与再生产。随着生产方式变革，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由此形成了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

第二，列宁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时代作出深入分析，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也

必须符合时代条件与本国国情。列宁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在继承马克思与恩格斯时代观的基础上,基于20世纪的世界局势,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大时代”与“小时代”相结合的时代分析方法。如上所述,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转变为主要依据,从社会形态的历时性演进对时代转变进行了解释,这在列宁的分析框架中属于一种“大时代”观。在列宁看来,研判时代必须遵循两个步骤:一是将时代转变的客观条件置于“大时代”的分析框架之中,“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5](091)}二是采取“小时代”的分析框架认识和解释某一国家所处的具体状态,“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5](092)}基于唯物史观的时代分析方法,列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时代特殊性与民族多样性,必须走符合时代条件和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第三,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时代观,分析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观是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时代分析,可以说,其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6](044)}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依据客观历史条件正确判断时代嬗变,科学制定出了国家的发展战略。在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基于世情、国情和党情,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关时代问题的新见解,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认为其开启了世界历史新的发展时期;二是将理论与现实结合,基于革命与战争的大背景,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三是敏锐洞察到战后亚非拉国家将出现民族独立浪潮,并明确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将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运

用于对新的历史时期的分析和论证,确立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战略,揭示了国内外形势与时代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其时代观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当今世界处于开放时代,也处于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时代,既要大力发展科技,实现生产力发展,也要走对外开放道路;二是继承与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格局的观点,重新分析世界格局新变化,将其概括成“东西南北”格局,并基于世情提出了从两极向多极转变的主张;三是将“东西南北”问题进一步概括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并指出其是时代的主题。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时代观的历史演进是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21世纪初,江泽民指出,世界进入21世纪,中国也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重申了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

二、“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时代观的新飞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新飞跃。其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判断,同时也强调了对当代世界格局的影响。

第一,“变与不变”,是“新时代”重大判断的立论依据。“新时代”是党的十九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内外部条件的“变与不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进行的科学研判。

首先,从“变”的角度看,“新时代”重大判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变化为根本依据。从历史成就上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为进入“新时代”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十个维度,即经济、改革、民主法治、思想文化、人民生活、生态、军队、港澳台、外交、从严治党,对其进行了科学而全面的总结。从实践上讲,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党政方针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全面耦合效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

进程中实现了整体性的发展,表现为:在价值观念上更加以人民为中心,在经济发展上更加倾向于创新驱动和共同富裕,在政治运作上更加注重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发展模式上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在国际交往上更加积极和主动。从主要矛盾上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即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本质上,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其转化从理论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从现实上反映了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均发生质的转化与飞跃。从国际环境上讲,由于国际格局和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国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多。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积极主动地拥抱世界、融入世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加之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进入了新时代。

其次,从“不变”的角度,习近平鲜明地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P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未脱离中国在总体视域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习近平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P12]}

显然,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的“变”与“不变”紧密关联,“变”的方面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在历史新时期面临的新挑战,“不变”的方面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

将长期以初级阶段的状态呈现,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第二,“三大维度”是“新时代”重大判断的宏观视角。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内涵是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前提。

一是民族复兴的视角。“新时代”重大判断“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P10]}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三座大山”极大地遏制国家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成为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通过艰苦奋斗,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了,这为国家后面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升,中华民族“富起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新突破,中华民族在“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基础上迈向“强起来”的新征程。由此观之,“新时代”伟大论断内在地蕴含着中华民族将在新的时代境遇下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跃升。

二是理论演进的视角。“新时代”重大判断“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P10]}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启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后经世界无产阶级艰苦卓绝的革命,越来越多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然而,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使得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逐渐地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历史性成就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示出科学社会主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实践活力。在建设 and 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本原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日益达成的层次性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阶段性表征。所以,从理论上讲,“新时代”伟大论断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和发展性;从实践上看,也为进一步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体现了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的辩证统一。

三是国际格局的视角。“新时代”重大判断“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11][10]}一直以来,现代化标准和路径都涵摄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流话语体系,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西方化。然而,中国的飞速发展向世界展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性、可行性与优越性,开辟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具有本质差异的现代化道路。“新时代”伟大论断正是基于中国已经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而提出的,“四个自信”生动地从世界历史之维展现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光明前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国际多极化格局的加强,世界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在当今时代境遇下面临现代化道路的抉择。历史现实表明,基于国情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式道路,为上述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选择和新方案。

三、赓续与延展:“新时代”重大判断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内在逻辑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把握时代脉搏、研判时代阶段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重大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继承与发展。

第一,理论赓续:“新时代”重大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科学继承。一方面,从基本原理上讲,

“新时代”重大判断科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与时代演化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3][P591-592]}基于中国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地指出当前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将人民需求与发展状态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评判依据,科学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基本原理。除此之外,“新时代”重大判断还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关于经济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决定时代性质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3][P9]}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深刻地提出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同时也明确了主要矛盾的“变”和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及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的“不变”。由此可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理解和把握是深刻的、科学的,严格地将时代转化的构成性影响因子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外部性表征进行了区分,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

另一方面,从主体逻辑上讲,“新时代”重大判断科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原则。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离不开人民群众,新时代的历史镜像由人民群众创造并以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实况为表征。列宁指出:“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17][P143]}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地指出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作用,同时还进一步强调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思想原则与行动指南。

由此,无论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宏观视野出发,或是基于“新时代”重大判断立论依据的微观透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原则。世界历史的主体是人民,新时代的主体也是人民,人民所具有的以民族国家为界限而内在涵摄的国民性与其所处的社会发展状态之间的张力性结构共同构成和反映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本质特征和内在原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中发生了转变,受历史阶段制约的主体发展需要在以物质财富不断丰富和人民精神境界不断提高为表征的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长起来,演变为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现实中则表征为对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的向往,理想与现实的张力构成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与演化的内驱动力。

第二,实践延展:“新时代”重大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内涵式发展。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实践的理论成果,“新时代”重大判断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内涵式发展。

一方面,“新时代”重大判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新的时代主题。真正能从宏观上概括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及其主要内容的才能称之为时代主题,因此,时代主题具有整体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自诞生以来,其主题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向度发生历时性转换,其中,无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和平与发展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主题。“新时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国内外形势变化为背景,在探索“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提出的新论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方位的科学研判。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为“新时代”的核心主题。

另一方面,“新时代”重大判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科学内涵。“新时代”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作为其核心主题,强调我国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而科学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的历史方位,这与以往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主题和内容形成鲜明对照。列宁认为,时代划分是有条件的,是相对的,能作为时代分界线的应当是那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时代的主要内容和方向由该时代占中心地位的阶级决定。“新时代”重大判断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而提出,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科学内涵。以研判内容为主要向度进行历时性考察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在不同时期的外部样态与内在本质呈现出同质异构特征,展现出大历史观的倾向,将人类社会分为不同社会形态,深刻揭示出不同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研判其在不同时期发展的历史方位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此外,“新时代”重大判断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研判的科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为研判社会发展的时代方位的重要指标,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张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8.
- [7]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